

于慈江著

楊絳，走在小說邊上

元昶敬題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于慈江著

楊絳，
走在小說邊上

元祖敬題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北京·廣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绛, 走在小说边上 / 于慈江著.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4.10

ISBN 978-7-5100-8402-7

I . ①杨… II . ①于… III . ①杨绛—小说研究 IV .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3303 号



著 者: 于慈江

责任编辑: 陈俞蓓 齐 星 杨林蔚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 张跃明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4038355)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 × 1010 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8402-7

定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
恭贺杨绛先生
与小说结缘八十周年



序 一

对杨绛小说经验的细读、感悟与阐释

杨绛是一位独特的作家。

她写剧本，写小说，写散文，也做翻译。她是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撰写研究论文又是她的“专职”。她是小说家？散文家？还是学者？翻译家？她自己否认是学者，又说写小说还停留在“试笔学写阶段”。如果你要确定她的身份，还真有点拿不准主意。杨绛另一个独特的地方是，从事写作已经几十年，作品数量却不多。就拿她最看重的小说创作来说，加在一起也不过八种：七个短篇和一个不长的长篇。论文、译作和散文集数目也有限。然而，这并不妨碍许多读者对她的喜爱和敬重。据我了解，不少人有这样的看法：无论是翻译，还是小说、散文创作，杨绛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和贡献。比起有的多产作家来，可以说是以少胜多多了。

不过，杨绛的魅力不是色调斑斓，一眼可以看得出的那种。作品透露的人生体验，看似无意其实用心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委实需要用心琢磨才能深味。20世纪80年代，我在课堂上讲她的小说、散文，曾为学生读过《干校六记》写“学部”（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下放”五七干校出发情景的一个段落。当读到“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的时候，学生都笑了。但似乎有某种苦涩袭来，大家顷刻又寂静下来。情绪的这一转换，应该是学生体味到了杨绛接着写的感触：眼见俞平伯先生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

远赴干校上学”“看着心中不忍”。这样节制、朴素平实、略带揶揄的文字究竟“有什么好”？这是当时留给学生的，也留给我的问题。

因此便想到，要讨论杨绛这样的作家，最好是寻找到和她的风格相适应的方法。读了《杨绛，走在小说边上》这本书，猜测作者也可能有这样的考虑。于慈江对杨绛的文论和创作风格有这样的判断：虽不乏“十足的实验性”，但基本上是沿着“经典的清晰脚踪规行矩步”，有着某种“保守”的、非时兴的性质。相应地，他的《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一书也在努力拉开与时兴的、八股式论说的距离。虽然开头部分仍留有当前学位论文的套子的嫌疑，但这本书既然本来就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知道，面对时下如此强势的学术体制，有时你要不“就范”也不大可能。

于慈江这本书的展开方式，也许可以称为就事论事的方式。“就事论事”在这里没有贬抑的意思，指的是不预设理论框架，不生硬挂钩时髦话题，也没有频繁地对时尚理论引经据典。它以对象的性质为依据，平实地选择合适的论说态度和方法。这种态度、方法，一是表现了足够的耐心来倾听、理解对象的言说，而后决定是否接受、呼应或质疑、辩驳；二是在相应的知识、理论准备之外，也开放心情、境遇、悟性等感性经验的加入。还有一点是因为杨绛的写作涉及多个领域，故而将文论、翻译、小说创作等各个方面加以勾连、比照，让它们互证互释，也是这部书论述方法的一个基点。这样做，有助于杨绛艺术创造奥秘的深入揭示，也补足以往研究大多侧重她的小说、散文创作，对小说翻译和小说理论关注不够的缺憾。

这种耐心的细读和感悟为我们显现了杨绛理论、创作中值得珍视的点滴。比如，小说既可娱目快心更堪阅世启智的主张，艺术虚构的重要性的强调，“艺术是克服困难”命题的提出……说杨绛的翻译是采取选字、造句、成章的“工序”，她的译文“将书卷气的文雅、精致和口语化的随和、自然这两个貌似对立的因素相当理想地交融于一体”；说杨绛笔下的知识分子“不乏良知却又终是肉眼凡胎”，“每思振作却又免不了和常人一样食五谷杂粮、得过且过”，“一旦有临危受命、挺身而出的机会，往往会畏葸不前、妥协退缩”；说她的小说描摹和透析人性与世态，但结尾仓促并不见佳，值得称道的似乎不在念兹在兹的人物塑造（“虽然尚称丰满，

但前承后继个性雷同明显有类型化痕迹”），而是场面的安排和烘托……凡此种种，都给我们很多启发。

在《杨绛，走在小说边上》这部书中，比较突出而又论述充分的当是讨论小说翻译的部分。在这里，作者打开他的细读和感悟，将杨绛的小说翻译放置在近现代翻译理念争执的背景上，并在与其他翻译家、与其他版本的比照中，有说服力地彰显杨绛的翻译理念和译作的优长——也不为贤者讳地指出存在的缺失。这样深入的讨论，全书中还有许多。比如，在论及杨绛的菲尔丁研究（1957）和《事实—故事—真实——读小说漫论之一》（1980）这篇论文时，该书就用不少的篇幅，重点讨论了“虚构”的问题。于慈江注意到，杨绛有关“虚构”的强调，既是立足于小说的艺术方法、规律，也可能是在表明与人的存在相关的叙事伦理。因此，才会引入批评家克默德、诗人斯蒂文斯关于虚构的论述：“终极信仰一定是在一种虚构之中”；“如果没有一种至高无上的虚构，或者如果连它的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的话，那么命运就会变得非常残酷”。

当然，这个问题（包括杨绛有关典型、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的讨论）也还可以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语境中来观察。在20世纪50—70年代，对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的那场争论，文论家——也包括这个时期大学文学系出身的人——大都耳熟能详。我们明白，马、恩针对拉萨尔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的批评涉及的是作品中人物真实性的判断，以及对济金根这一16世纪初农民战争中的“叛乱骑士”的政治评价。但是，如佛克马所说，“从文学观点看”，当拉萨尔“声称他的济金根不能用历史学家的标准来评价，只能作为诗歌创作来衡量时”，他“提出了文学修辞的问题”，“强调文学的虚构性”的合法地位（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陈圣生等译，三联书店1988）。在一个径直将艺术等同于现实，将画像等同于画中人物，将“生活难道是这样的吗”作为艺术评判最高标准的年代，“虚构”、独立解释世界是写作者需要争取的，但也难以获取的“权利”。在20世纪50年代初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这种“难以获取”得到了证明——在理据、逻辑上，这一批判也就是马、恩与拉萨尔冲突的当代中国版本。

谈到杨绛的时候，不少人都会触及“隐身衣”、边缘人的话题；《杨

绛，走在小说边上》的作者于慈江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这本小册子里，也把杨绛和巴金放在一起，讨论当代作家的生活位置，他们在处理社会、历史问题以及艺术方法上的不同选择。我也讲到杨绛为“我不是堂·吉诃德”，甘愿“身处卑微”，“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的生活态度辩护的情况。之所以要做这样的辩护，这个辩护之所以得到普遍关注，是由于社会情势和思想传统，近现代中国存在着文人、作家必须介入政治，承担预言和拯救的社会责任的强大压力。在这样的情境下，才产生了杨绛式的对潮流边上、之外的生活方式合法性，以及他们精神上也可能高贵的申述或辩白。《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一书在最后一章里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做了拓展和转移。它借助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述，将杨绛式“适情任性”生活态度的个体选择，替换成一种具有普遍性含义的“业余性”，而后以“业余立场与专业精神”的描述，将它看作在专业化潮流中“抵抗知识分子的堕落”的、可供借鉴的生活与精神取向。在对杨绛经验的阐释中，这一替换、转移确实进一步发掘、提升了她理论和实践中最具价值的那些部分。

不过，需要补充的是，如果涉及个体的人生选择，在重视如上所述的这一经验的同时，也必须警惕它的同质化——作为一种精神态度，它不应成为个体多样选择的阻碍。其实，所谓“英雄”和“普通人”、“边缘”和“中心”、“业余”和“专业”，之间的边界并不一定那么分明和稳固。时势的变更，被重视之物不可避免的“本质化”进程，都可能让位置互换的事情发生。这正如诗人柏桦所言：“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 / 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现实》）

洪子诚

2012年10月于北京蓝旗营

序 二

他摸到了学院学者文学家的脉搏

(一)

于慈江在我的博士研究生中是最特殊的一个，也是最令我感动的一个。他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紧接着就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并在我的“门下”继续自己的学业的。这在当代的中国，恐怕也是一件绝无仅有的事情，同时也是令我这个中文系的教师感动不已的。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文学研究曾是一门显学，但那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到了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则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大陆的一门显学，毛泽东思想最初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逐渐走到中国大陆文化的前台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就发展到了极致，同时也使之深受伤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就活跃不起来了，代之而起的就是经济学。“五四”之后，“文化”改变了中国，“新文化”改变了中国；1949年之后，“政治”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改变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经济”改变了中国，市场经济改变了中国，经济学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一门显学。所以，于慈江在取得了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又来转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着实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情，也是令我这个文学呆子十分感动的事情。

我最初建议于慈江做的题目，是中国现代文学对经济生活的描写，但于慈江没有接受这个题目，而是自行决定以杨绛为研究对象。说实话，这也是我始料所未及的。但到后来，在于慈江的研究活动的带动下，我也渐渐咂摸出了他这个选题的味道。所以，我应当感谢于慈江，因为是他的研究，引导我重新思考了杨绛和她的文学活动，并对这样一个学者型的文学家的价值和意义，有了一个更加切近和具体的了解。

(二)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因了余秋雨散文的走红，就有了“学者散文”这样一个名目。余秋雨的散文我读得不多，但在我的印象里，却不把他的散文归入“学者散文”之列，因为虽然他曾经是个学者，是研究戏剧理论的，但他的散文却与他的学者生涯没有本质上的联系；因为我们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感觉到的并不是他作为一个学院学者的气质，而更是一个扬才露己、带点浪漫气息的文学作家的气质。我认为，在上世纪末，堪称学者文学家的，主要有下列几个人：其一就是杨绛，她的《洗澡》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学者小说”；其二是季羨林，其三是傅雷，季羨林的《牛棚杂忆》和傅雷的《傅雷家书》应该是标准的学者散文；其四是郑敏，她在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大概也带上了更多学者诗歌的特征。

所谓“学者小说”“学者散文”“学者诗歌”，我认为，不应当只是它们的作者曾经是一个学者或现在仍然是一个学者，而应该是其作品本身就流露着浓郁的学者的气息。它们的作者是长期在学院文化的氛围中生活的，是在与身边大量学院精英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一系列人性的和人格的特征的，是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这都使他们更习惯于理性的思考，更习惯于理智地面对现实的世界和与自己有关的一切，性格偏于内向。这就过滤了情感中大量直感直觉的成分，使其性格更趋于稳健和平，既不属于热情洋溢的那一类，也不属于感伤悲观的那一类，即使表现的是自己人生中的坎坷经历和悲剧感受，也有他们更多的人生的思考。而作为作者的他们，却不会因为“情”不可遏而在自己的作品中有什么“失态”的描写。

这种学者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实际上一直是有很大势力的。在“新文学”初期，像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等人，都既是著名的学者，也是著名的作家。只不过在那时，学者和作家的界限还没有后来那么清楚，所以我们也无法截然地分出一类学者的文学来。到了1949年之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和从事创作的文学作家的界限就愈加明显起来。虽然那时中国大陆的学院学者也已经感到了做人和作文的困难，但作为一个阶层，到底还像是漂在中国社会表面的一层油，面子上还是能够维持下去的，因而早已养成的那种温柔敦厚的个人的气质，还是保留了下来。到了“文化大革命”，其地位才一落千丈，也领略了在学院学者的地位上所不可能领略的人生百态，有了文学创作的素材。但是，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无奈这时作为一个学院学者的性格已经养成，虽然这份人生的坎坷是过去所未曾有的，但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当重新回到学院学者的地位上反思这段经历时，那份学者的矜持和尊严仍然没有丢失。而在这时进入文学创作界的文学作家，又大都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些学者是站在高处俯视人生的苦难的；而那些新进的青年作家，则是在人生苦难的深渊中挣扎着向上爬的。所以，前者的作品在总体上趋向于稳健和平，而后者的作品在总体上则透露着躁厉不安，学者文学与非学者文学的界限就是异常明显的了。

(三)

“文化大革命”之后，靠着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恢复和发展，我也勉强跻身于学院学者的行列。但我们这代学院知识分子大多出身贫寒，很少是书香门第出身的世家子弟，“文化大革命”之前、之中又不断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所以对我们这些爷爷、奶奶辈的学术前辈的那份矜持和孤傲，反而感到生疏和隔膜了。我当时主要是从事鲁迅研究的。鲁迅虽然也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和教授，但在文学创作上却不属于稳健和平的一派。我喜欢的也是他那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热辣的风格。所以，虽然一向对季羨林、傅雷、杨绛、郑敏这些学术前辈心怀钦敬，但对他们的文学作品却甚少注意。一直至于慈江将杨绛研究作为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特别是读了他的

论文初稿之后，杨绛作为一个学者文学家的形象才在我的心目中重新活了起来。

我爱上文学，是在初中的时候。由于父亲是个“国家干部”，他自己也喜欢买书，所以我向他要钱买几本自己愿意看的书，还是不被禁止的。在开始，一个高中的爱好文学的“大朋友”自愿担当了给我选书的任务。他给我买的第一本书是《安徒生童话选集》，我当时有点不高兴，认为既已经成了“中学生”，还让我读安徒生的“童话”，是有点看不起我；到了第二次，他给我买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就更不高兴了，因为我在小学已经读过一遍，并不想重读一本已经读过的书；所以到了第三次，我就不让他给我选了。而这一次，我自己选购的就是菲尔丁的《约瑟·安特路传》。

它虽然与杨绛在自己的论文里翻译的同一本书的书名不尽相同，但在我的头脑中，菲尔丁这个英国小说家的名字却是与杨绛联系在一起的。在那时，我还长期订阅着一份学术刊物——《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前身）。由于读了菲尔丁的《约瑟·安特路传》，并且颇感兴味，杨绛发表在《文学研究》上的《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自然就格外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这篇文章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它不仅使我对作为“英国小说之父”的菲尔丁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同时也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小说理论。

在初中，我还买过一本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小癞子》。大概不是全译本，薄薄的一册，32开本，是不是杨绛翻译的，我也不知道，但对于《小癞子》这部书在西班牙文学史上的地位的了解，也是通过杨绛的文章才得到的。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部文学巨著《堂吉诃德》大概是我到了大学才读的。而杨绛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则是我迄今为止读过的唯一一篇研究和介绍这部西班牙文学巨著的文章。

杨绛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萨克雷〈名利场〉序》也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萨克雷与狄更斯被认为是英国19世纪两个齐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我读过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初中时读了一个缩写本，大学时读了全译的上下两卷本。高中时读过他的《老古玩店》。还买过他的一本《艰难时世》，但至今没有来得及

读完全书。萨克雷的《名利场》一直想读，但终没有读。所以，我对于萨克雷《名利场》的了解，完全是从杨绛那篇序言中获得的。

杨绛还介绍并翻译过法国作家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这部小说同菲尔丁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萨克雷的《名利场》、拉伯雷的《巨人传》一样，都是我很早就想读而至今未读的小说名著。但我读过勒萨日的另外一部小说《瘸腿魔鬼》，并且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20世纪80年代，一家报纸让我向读者推荐几本书。我认为西方作家的那些代表作，读者大都熟悉，不用我推荐。我就推荐了几本人们不太注意但我却感到颇有意味的书，其一就是勒萨日的《瘸腿魔鬼》，其二是马克·吐温的《傻瓜威尔逊》，其三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二重人格》。

我之所以重视外国文学，在更大程度上是受了鲁迅的影响。他的《青年必读书》更是使我将课外阅读的热情主要倾注在西方（包括俄罗斯和东欧、北欧各国）文学上的直接原因。所以，我关注的主要是西方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19世纪俄罗斯文学更是我所崇慕的对象。但尽管如此，现在想来，我头脑中的文学天空还是有一小片是属于杨绛的，是杨绛用自己的手给我拨开的。

（四）

这使我想到学院文学学者在一个民族文学以及文学观念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少年都要通过阅读来获得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其中的文学阅读则在其全部的阅读中占有绝对大的比重。这种阅读，在开始阶段，往往是盲目的，是受到当时社会环境阅读趣味的裹挟的，与阅读对象也像隔着一层布满烟雾的玻璃一样，是模糊不清的，是朦朦胧胧的，是似乎明白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的。这种阅读看来是自由的，实际又是最不自由的，是被当时社会环境的阅读倾向所绑架了的。待到清醒过来，才感到自己已经在一些毫无意义的阅读中浪费了太多的生命，而那些应该阅读却没有阅读的好书则再也没有机会阅读了。正是因为如此，学院文学学者的作用和意义，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的作用和意义才表现了

出来。学院文学学者的阅读不是仅凭个人当时的兴趣，不是随大溜的，不是别人读什么自己也去读什么，而是在对文学的历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之后，才选择那些更有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作品来阅读的，并且阅读的时候不是仅仅看重其表面的兴趣，而更加重视体味其内在的意味，是带着欣赏的态度、研究的态度和理性的眼光去审视对象的。这同时也像擦亮了隔在我们和作品之间的那层布满烟雾的玻璃一样，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作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实际上，历史上的很多文学名著，像曹雪芹的《红楼梦》、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歌德的《浮士德》、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卓夫兄弟》、卡夫卡的《审判》、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及鲁迅的小说、散文诗和杂文，等等，没有前辈学者的研究和介绍，我们是不可能仅凭自己的阅读便能直接感受到它们深层的价值和意义的。这就使我们的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无法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所以，在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文学创作家的创作是不可或缺的，学院文学学者的文学研究活动也是不可或缺的。

文学创作家依靠的首先是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感受和体验，学院文学学者首先依靠的是自己广博的文学知识和在对文学作品直感感受和体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智的和理性的思考能力。所以，学院文学学者不论对于什么，都是要想一想的。一个文学创作家写了一部文学作品，常常是自己感到满意了，也就到此为止，未必再去思考它的更深层的价值和意义，未必重视读者将怎样阅读、感受、理解和接受它。这也就是为什么《奥勃洛莫夫》的作者冈察洛夫说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杜勃罗留波夫在其《奥勃洛莫夫性格》一文中所揭示出来的他的作品《奥勃洛莫夫》的思想价值和意义的原因。而一个学院学者，即使自己创作了一部文学作品，也常常是要站在一个学者的立场上想一想的，也常常是希望读者要以他认为正确的方式感受和理解他的作品的。

我认为，当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我们会感受到于慈江这本《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作为一部研究著作，实际是有点匠心的。他不像我们那样主要用杨绛自己的文学思想分析和解剖她的文学作品，也不像我们那样主

要用杨绛的文学作品论证她的文学思想，而是分别考察她的小说创作、小说研究和小说翻译，并从她对自己小说创作、小说研究和小说翻译的看法中考察她对小说的理解和认识。这就找到了能够将杨绛全部文学活动串联起来的一条红线。而这条红线恰恰是一个成功的学院文学学者与一般的文学作家不同的地方，是学院文学学者较之一般文学作家更少盲目性、有更多理智的思考和理性的判断的原因。他们的思想建构与其文学实践是同步进行的，他们的感性经验与其理性的思考也是共生同进的。

“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社会变动赋予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进青年作家以崭新的生活经验，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更加鲜活的特征，但历史也剥夺了他们接受更多学院文化教育和熏陶的机会，因而他们的文学创作又有着极不稳定、无端变化的弱点。他们似乎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升降沉浮的，开始大红大紫的作家后来却变得默默无闻，开始默默无闻的作家后来又大红大紫。即使同样一个作家，也常常是前后不一、没有一个内在的统一的思维脉络的，一会儿陷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里，一会儿又掉在经济竞争的深渊中，似乎始终无法找到驾驭自己的那个舵。

当然，学院学者的文学也有自己的弱点，但他们的文学作品当时并不多热，现在也并不多冷，学院学者的那点矜持和孤傲到底还是给他们的思想和艺术留下了自己的统一性。在这个意义上，于慈江的这部学术著作是值得重视的，也是有它的出彩的地方的——他摸到了学院学者文学家的脉搏。

祝贺于慈江《杨绛，走在小说边上》的出版！

王富仁

2014 年 4 月 26 日于汕头大学文学院

序 三

于慈江的归去来

给慈江兄的著作写读后本是我乐意的事，但我却一直在推辞。慈江兄则一直在催讨，且催讨得理直气壮。

我知道自己欠了债，欠了一笔感情债，理想债，是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80年代北大，以及80年代为理想、为文学志业、为精神志趣而焦灼、痛苦，而耗费生命来上下内外求索的一代人的。

这是80年代的时代精神和北大校园文化合力塑造的一代人。

在“文革”的浩劫之后，他们迎接晨曦，朝日一般喷薄而出，铺洒着阳光，浸润着知识的雨露；他们仰望夜空，敬仰满天星斗和心中的道德律；他们暗夜思索，追寻宇宙、社会、人生的疑踪，不断问难自我和自然；他们神往于创造，在思想解放的意识形态战场策马跃兵，躲闪拼杀，于万千军中取真理的首级；他们汇集了批判的能源，聚光一束，照亮因改革深入而日渐浑沉黯淡的夜空。他们后来陆续毕业星散了，有的光芒消散，有的与世浮沉，有的将理想化为信念和意志，凝结为人性，遇社会冷热，依然有所感觉，给人温暖。

我说的是80年代毕业的几乎所有北大学生，中国所有的大学生。

而慈江兄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的80年代北大记忆中，慈江兄是占有重要位置的一个人。

当年他似专为体现青春的意志而来，高大、阳光、帅气，热爱诗歌和演戏，有浓烈的理想主义和纯粹的文艺气质。未名湖畔、办公楼礼堂，经常回荡着诗歌的吟哦；教室听课、宿舍卧谈，往往都是精神的飨宴；楼道梦游、食堂舌战，宛然伴留爱情的风味；球场游戏，水房高歌，无论内外心神俱可一醉；林下信步、雪地留踪，恍如浪漫主义的骑士作风。

我们一起参与过校园诗歌朗诵会、校园文学奖以及一些学术论坛的组织。我至今记得他主持北大校园诗歌朗诵会的神采。

我们一起在宿舍交流、辩论、探讨。我至今对他借用音乐剧理论探讨诗歌叙事节奏的论文（《新诗的一种宣叙调》）记忆尤深。

我还记得当年腹诽过的他戏剧化的传记写作，感怀于他对文学自我的专注和提升。

但印象最深的，是他研究生毕业后，选择到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以及之后的出走去国。

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慈江兄似是怀着国事和“家事”的双重失落而出走美国的。我记得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薛涌夫妇、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伍晓明先生的去国也在几乎同时。他们都是我尊敬和钦佩的朋友，道义与情义之交。

那是夹杂着感时、感伤、感奋情绪的一种出走，是一代优秀人才的出走，是一个时代、一种价值观的出走。

然而出走又如何呢？中国依然在曲折前行，出走远方的朋友却断绝了消息。

有一次看电影，发现里面有个演员很像慈江兄。张欣说，好多出国的同学沉一段后总会浮上来，可于慈江呢，好像一沉十几年都没人知道他的去处了。

有时和当年出走的同学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相遇，我往往会感慨他们和当今中国的隔膜。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好像永远停留在80年代了。

虽不知道慈江兄是否怀沙自沉，但在我的记忆里，他也永远停留在80年代的北大校园了。

就像慈江兄的突然消失一样，他的出现似也令人措手不及。

是在纪念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00周年的会上，散会时突然看到慈江